

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

近代历史探研录

● 皮 明 麻 著



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

近代历史探研录

皮明麻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近代思想

近代历史探研录

庾明庥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南郊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武汉市洪山新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3.125 字数32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500册

统一书号：11403.06 定价：3.00元

前 言

历史之海，波涛翻滚，深不见底。当我漫步大海之滨，折服于它的浩渺，而自愧学识之谫陋。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许，其言其志成为后世治史者之风范。通古今之变为一永恒的课题，亦为一现实的课题。为“通古今之变”，既需习古史，尤需治今史，还需展望、预测未来之史。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之一百多年的近代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的巨大社会变动。研习这段历史，对“通古今之变”，其意义可谓深矣。

若干年来我潜心学习近代历史，自度无力驾宏驭远，只能就学见所得，弥缝补苴，对较能入门的问题进行探研。就像涉足大海边的初游者，得不到深海珍奇，而只能在岸边和浅海拾取一些贝类。到底拾取了什么，挑挑拣拣，汇成了这个集子，作为史海拾贝的记录。其意不在敝帚自珍，主要为了从零开始，以期游向更广的海域。

在集子中，汇编了我近八年来有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部份论文，其中涉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近代思想的较

多。这些文章又较多猎取湖北、武汉重大历史题材，这是基于自身深感探习近代历史固然要宏观全国，但亦应立足地方，加强区域研究。而湖北、武汉在全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理解和意向。

近代史研究，在史学中堪称蔚然称盛的领域，亦为人才密集，思想活跃，新说纷陈的领域。从近代史线索到诸多具体历史问题，见仁见智，人言言殊。而其间警辟闪光之史论，时有所见；对史事之探幽发微，更层出不穷。我师法前辈，亦横向求教，但许多问题仍百思不解，稍有所解者亦未必正确。惟力求遵循实事求是的治学古训，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真理，以求学得一点真知，庶几不歪曲历史的自我形象，冀图从探索历史的真实中服务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宏图大业。

此书之所以能及时付梓，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条件，特致谢忱。

皮 明 庠

1986年5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历程·····	(1)
西学东渐论·····	(21)
论林则徐湖广禁烟的思想和实践·····	(44)
论洪秀全对孔教态度的演变·····	(56)
《鄂城纪事诗》所载杨秀清武昌“谒圣”事考伪·····	(74)
太平军初克武昌后的战略决策·····	(92)
马克思主义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108)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洋务平议·····	(125)
“中体西用”论评议·····	(145)
清末维新派之“社会主义”思潮剖视·····	(158)
自立军起事中的唐才常·····	(171)
论自立军政治纲领和性质·····	(190)
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创建史实·····	(210)
武昌首义——中部开花的“内爆型”革命·····	(241)
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	(253)
孙中山和武昌首义·····	(291)
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的成败·····	(307)

辛亥革命时期之汤化龙透视·····	(324)
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史实考析·····	(341)
武昌首义后的反黎风潮·····	(354)
民初刘师复派无政府主义之兴亡·····	(364)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383)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402)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 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历程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认识和编纂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来研究这段历史，几乎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进行的。在旧中国的几十年中，近代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搜罗编次以及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不无可取之处，有些史家的激越的爱国热情也自然地倾泻在他们的史笔之下。但总的看来，缺乏大规模收集史料的基础，而贯穿于其中的又多为唯心史观，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其中如蒋廷黻的著作，充斥着对历史的曲解。

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才走向科学。刘大年在日本赤门谈史时谈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就象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天文学、生物学的巨大功劳一样，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主张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就在这里。”半个多世纪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进行艰辛的开拓，从而使这一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成果峰峦叠见，蔚为大观。

一 建党初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对 中国近代史的早期探索

当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时，就涉足中国近代史。他们不是从职业的史学需要，而是更多地从开创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不是以学者的面貌，而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战士的姿态，进入了近代史的阵地。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与他的政治水准和史学卓识相适应，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也浇灌一批最早的果实。他在1920年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把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导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析，指出主宰中国思想界二千多年的孔子思想是“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而在近代，随着“农业经济”的破坏，“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具体论述近代史事，但却以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启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此后，他又写了《胶济铁路史》（1922年）、《黄庞流血记序》（1922年）、《纪念五月四日》（1923年）、《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1924年）、《这一周》（1924年）、《土地与农民》（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史上的位置》（1926年）、《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1926年）、《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年）。这些文章着眼于政治，而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进行了论述。以太平天国为例，晚清以降，地主阶级史家对之记叙和评论者不乏其人，然而在唯心史观支配下对这次运动的性质以及重大史事多所歪曲、颠倒，即便同情这次运动的进步史家也无力洞察底蕴，形成科学的结论。李大钊跳出前人窠臼，研习马克思对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论述，揭示出这次运动是“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青年们，身受外来的经济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山烧田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李大钊文集》

第541—542页，以下引文出于此书者，只注明页码）并进而论述这场运动是“反满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对于运动失败的原因，他既从革命队伍主观方面指出：“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又从客观方面指出“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美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这些看法是当时所能达到的对太平天国的破天荒的创见，是给科学的太平天国史所铺下的第一块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树立起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与当时相距不远，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不能不引起党的政治家、理论家的关注。如何发扬义和团运动中爱国的民气，总结这次运动的成败得失，成为具有迫切政治意义的史学课题。1924年8月，北京反帝大同盟倡议以九月七日为“辛丑和约”国耻纪念日，之后三年在全国各地每年都举行“九七”国耻纪念。党所举办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均办“九七”特刊，专门论述义和团、评价义和团。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张太雷的《列宁与义和团》（《向导》第81期）、瞿秋白的《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肖楚女的《中国人之怨望》（《向导》第73期）、恽代英的《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向导》第128期）、林育南的《介绍第七届全国学生大会决议案》、周恩来的《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以及彭述之、罗章龙所写的文章等，都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义和团的作品，共同特点是翻各类反动派对义和团的陈案，推倒对义和团以“拳匪”相称的诬蔑之词，对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给予充分的

肯定，对义和团的历史地位和失败的教训作了初步分析。如蔡和森说：“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和各商团，第二是1900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义和团排外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是中国国民革命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很显然，这些热情洋溢的讴歌与反动派“庚子拳乱”的诅咒声是反映根本性的阶级对立的。对义和团的这些肯定性的评价，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群众斗争所表现出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与激越的爱国情绪是紧紧相连的。

辛亥革命史在这一时期也为不少人所瞩目。当时面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新局面，探讨辛亥革命、探讨孙中山，就成为迫切的政治需要。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李大钊对辛亥革命的一批论文外，如张太雷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1924年）、《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陈独秀的《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第86期），瞿秋白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彭述之的《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第86期），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立论的重心在解决党在民主革命中的路线、方针、战略问题，但已对近代社会及阶级作出了考察，也论及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以及近代会党等许多史学问题。恽代英写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泰东书局出版）。这部四万字的著作是在1926年恽代英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的基础上编成的，简明、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大革命前期的历史。恽代英没有采用多少马克思主义引文，却以通俗的语言，传出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新见解。

从“五四”前后到大革命失败前，中国共产党处在创建和幼年时期。幼年的党显示出无比的青春活力和高昂的革命锐气，也伴随着理论上、政治上的不成熟。反映在近代史方面，就是进行了开创性工作，一是开始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近代史。革命者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恰恰成为他们对近代史建立科学观念的指路明灯；二是对近代史上一些现实意义特别重大的问题，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进行了初步研讨，其目的是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配合现实的革命斗争，可说是以史论政、政史结合。很明显，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之运用于近代史是初步的，触及的只是某些具体的个别性的问题，还不可能窥探全貌，把握规律；就已经触及的问题看，偏重于粗线条的说明和评述，而缺乏史的叙述，这当然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积学时日不够，不可能进行坚实的史料积累和考析有关，因此普遍存在笼统、空疏的弱点。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史科学体系的形成

中国近代史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常常迫使人们对近代历史问题作出回答，而近代历史问题的探讨又往往为革命斗争提供某种历史论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党和人民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当时众说纷纭，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者有之，认为二十年以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者有之。要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作出马克思主义回答，就必须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论断，而要论定“今天”的中国社会性质，又牵动了对中国社会“昨天”和“前天”的探讨。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清中国社会之所自，就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

引出科学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革命实践的需要成为这场史学，主要是历史哲学论战的动因，而论战的理论成果，恰恰是为了从社会性质中去求得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对象以及前途等问题的科学规定。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直接系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础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抑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生命派的社会、历史学家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而这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是封建领主……”。

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则说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

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济、哲学家，结合近代历史实际、社会实际，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种论证和列宁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理论是一致的，和一九二二年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阐明的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是一致的。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1933年）、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发展及其将来》（1930年）、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问题的研究》（1930年）《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1930年），都从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估计是正确的，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并深入揭穿了隐藏在這些谬论中的反动政治意图。

这次论战并且进而深入到中国社会史领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风雨如晦”之时，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努力利用中国古史的资料，包括他以攻坚的

姿态在甲骨文、金文考释方面所取得的远逾前人的成果，担负起了论述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必然性的使命。一九二八年，他写了《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等文，证明中国并不例外，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存在奴隶社会，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遍真理性，驳斥了陶希圣、李季以及陈独秀等人所鼓吹的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例外论”。一九三〇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划时代的界标式著作，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系统阐述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它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而涌现出来的史学硕果。在这本书中的“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中国社会之概览”两节，论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革命——“资本制的革命”，主要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也论述了近代社会——“资本制”，指出其组织成份为“帝国主义——弱小民族、资本家——无产者”。（《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第30—31页）。作者的提法并不准确，但实质上说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几部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某一侧面的著作。其中如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对中国近代、现代职工运动进行了概述。李达写了《中国近代经济概述》，开近代经济史研究之先河。华岗在1931年写成三十万字的《中国大革命史》，适时地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叙述，发挥了有力的教育作用。钱亦石在大学中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其讲义由进步书店刊印出书（1932年）。

毛泽东同志重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这次论战的理论成果。在抗战初期，他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几个同志起

草，经毛泽东修改而成。这一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点，进行了简赅而又深刻的论述，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结果。毛泽东集中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也吸收了包括史学家在内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及前途诸问题。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科学的史学研究决不是躲在古史的暗堡中去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遵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地阐明祖国的历史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提供历史的和实际的依据。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学和史学等各方面，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特别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建设。第一，强调了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指明了近代史的学习、研究在整个历史教育中的突出地位，说明研究近代史不仅是史学家的任务，而且是广大干部的学习任务。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一些同志“对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心目中漆黑一团，号召大家转变这种不懂历史的状况；第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阶级状况和特点，对中国近代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对近代史中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对近代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进行了评价，而对艾奇逊等胡诌的中国近代史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第三，对于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

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延安成立了史学会，来自四面八方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史学家，对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进行了开创新体系的历史性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接到何干之的信，得悉他正在写《中国民族战争史》时，当即复信支持：“你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收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范文澜在延安写《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写作的。1940年范文澜同志初到延安，主持历史研究室，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写成了这部书。尽管上述通史著作由于受到史料及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免有不成熟或讹误之处，但在中国古代史成为一门科学的历程中是具有首创意义的。抗日时代，在近代史建设上，最早的是钱亦石的通俗性作品《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1936年）。稍后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1938年）。差不多同时，杨松、邓力群、华岗、翦伯赞等也拿出了成果。1940年，杨松和邓力群编辑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在延安出版（此书各解放区多有翻印，解放后由荣孟源加以整理，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这部六七十万字的历史资料书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中出版实非易事，书中附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研讨近代史的尝试。尽管这部书在选编史料上有不准、不全之处，但在近代史建设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与此相联系，党所举办的一些刊物上还发表了杨松的《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群众》第4卷18期）、《论太平天国十五年革命战争的经过及其战略上的措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2期）、《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5期）、《论法安战争与中法战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

争的战略研究》（《群众》第8卷第15期）、翦伯赞的《论中日甲午战争》（《群众》第10卷第2期）以及张燕西的《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群众》第七卷第九期）、夏绛的《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群众》第4卷第16期）。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了近代史的一些重要专题，但还不是对近代史的综合的系统的考察。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工作，是由范文澜等进行的。代表作就是以精思独得所写成的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总体考察的《中国近代史》上册（1945年），这本书在延安、晋绥等解放区多有刊本，影响巨大。我国近代史建设的科学体系无疑是以此书作为奠基之作的。这本书在1947年秋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校订过一次，略有增删；1949年5月，又作了第二次校订。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由于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以坚实的史学修养和较丰富的具体史料为基础，终于有这一部划时代作品的问世。此书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近代历史进行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考察，拨去了资产阶级对近代历史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的偏见，自创体系，思想深邃，语言精赅，精选史实，有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和对历史事件的科学剖视。解放后这本书多次翻印，而同类型的各种近代史著作也多追踪和借鉴本书的基本思想。范文澜被称为近代史科学体系的“开山”是不为过之的。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全部完成，在史实上也因受到条件的限制而有若干缺陷。而书中的某些观点，如洪秀全早期的“四大平等”思想，长期以来已成为人们习用的模式，实际上是概括得不确当的，近年来不少太平天国史学者已提出异议。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年代，解放区所主办的军政大学、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编出了一批《中国近代简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教学参考资料》等书籍，在普及近